

王晓明生命故事

访谈者：刘健芝

时间：20150507

地点：岭南大学 LKK201

健芝：我们想做系列的，跟你们做些访谈，思想家，一般的理解是看你写的东西和你的想法，但是对于这些想法是怎么跑出来的，你们生长的年代肯定有很多相关的方面，所以我们想做这些故事。我们之前和铁军和小戴做过类似的。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怎么把既有行动也有思想，怎么通过您的个人经历，家庭、教育，这些都会和大时代有相关，等于从四个方面来讲。个人、时代和实践。

刘：对您来说，您人生里面最激动的是什么时候？

王：激动是指正面还是都可以。最激动的是六四，那个事情，6月4日晚上，那天晚上我在上海，我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让我听外面的枪声。那个对我来说是，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国家暴力对人民，最震撼的事情。

刘：64年前，86年年底，87年年初，也有学生上街啊，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状况。

王：我从读书、工作到大学教书。整个八十年代，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一直有。87年有，也就是一般的，没有动用到，警察也是有，国家暴力其实并没有大规模的上场。64之前，军队进城，被挡住，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大家非常关心，那个事很震撼。

王：和六四相比，同样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文革。我的家庭是这样，父亲是大学教授，也是作家，他一直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我母亲是一个话剧导演，后来自学俄文，成为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我应该说是在文学家庭长大的。因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实行的是苏联的体制，有一条是给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很高的物质待遇，其实是要通过这样的制度，让高级知识分子，当时叫高知，为国家服务。所以中国在60年代也是实行这样一套制度，因此我的父母，他们其实是住在上海很好的西式公寓，我也在那里度过从小孩到青年少年时代，所以我的家庭在当时在文革之前是比较好的，我记得那个大楼是30年代造的房子，现在是历史保护建筑，是非常好的。在上海是属于最好的，当时是西式公寓。我住在那个楼里面，小时候的印象，也能看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的一个缩影，楼里面住的是几种人：上海市高级的干部、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专业人士-很有名的医生、然后是上海高级的军官，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人。不断看到，某一家忽然就搬走，原来是这家主人，或者父亲母亲，因为某种政治原因遭到批判和遭到清洗，后来又搬进一家，那就是所谓的新贵。共产党的干部的骄横是亲眼看到的，回到自己的大楼里面，12层的公寓，对待普通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他在会场上做报告的时候是不一样，那时他们很真实的面貌。我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迎接了文革。文革，我的父亲在1966年6月最早就被

当时上海市政府，那时候还是市委书记，在全市范围大会场宣布，上海市有 8 个黑帮份子，宣布有 8 个人的名单。第二天早上，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大标题，8 个人的名字，每个领域写一个人。我父亲是文学界选出来的，其他是音乐、戏剧、电影啊。京剧界是周信芳。我们家比较倒霉，一开始就变成牛鬼蛇神。我也比较惨，本来一起玩的小孩，因为我家是所谓的牛鬼蛇神，我家是狗崽子，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打我，然后小孩还到我家里来，拿皮带抽我父母，拿剪刀把我妈妈的头发剪得一塌糊涂，那时候就不能出门了，头发是这样被剪过的，这样你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牛鬼蛇神，任何人就可以在街上踢你，理发店也不会给你剪发。文革时候，我 11 岁，感觉到文革时候所谓的红色恐怖，而且，那些把我父亲宣布他是牛鬼蛇神的人是当时共产党高级干部，上海市的市长，冲到我家里对我父母拳打脚踢是住在我们大楼里面的高级干部的小孩-官家子弟。所以你说，文革让我说，人民反抗官僚的，有，但是是第二个，文革分很多阶段，到后来才开始。开始的时候，父亲这一批人，我们这一类家庭经历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子弟实行的所谓红色恐怖，当时在北京，那些被打死的教师，打死他们的是什么人，动手打的都是官员和干部的小孩，所谓的干部子弟。什么时候情况改变呢，我们大楼里面说起来有意思。我记得，1966 年 10 月 1 日，我们楼里面除了这些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在家里做保姆，像现在的菲佣一样，做保姆的人，还有一些打扫的工人，他们住在楼下，他们就开始起来，也开始起来造反，然后他们就用大喇叭在下面喊，每一家下来一个人，扫整个的花园，然后我父亲就赶快拿了扫把下去。我伸头出去一看，下面院子里黑压压站了好几排人，每一家都有问题，那时候所有官员都变成了牛鬼蛇神，而且很多夫妻两都是官员，两个人一起下去扫。最初动手到我们家打人的小孩，看见我也跟我点头了，因为他跟我命运一样。那个时候开始平常被压的底层的劳动者开始起来，造官僚的反。到那个时候开始，我父亲的处境开始大大改善。底层的人对他们没有仇恨，有仇恨的是平常对他们喝五吆六的人。

文革是很复杂的状况，有官僚阶级、统治阶级，共产党官员内部冲突，就需要通过镇压其他人为他服务，有权力斗争的这个，也有普通平常受压制的人利用这个机会起来反抗。我是 11 岁小孩，从大楼里面邻居的变化很真切地感受到，到了 80 年代以后，到了 90 年代开始有人提出来，重新来评价文革，不能用过于简单方式来理解。对我来说，很直接的，小孩子，不能很简单的完全用官僚阶级、干部集团内部的冲突和权力斗争来解释，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这里还有更大的社会。

刘：上海是当时 67 年年初有人民公社，66 年 10 月份开始有底层的出来。我从一些资料看，后来毛泽东说，好是好，只是玩一会就好了，不要真的是继续搞人民公社。那段历史是怎样的？

王：我当时还小。我父母是属于牛鬼蛇神，被关在牛棚里面，不能出来，我并没直接参与，我当时小，也没有资格参与这个事情。我自己很起劲，天天上街上去看大字报。那时候每天街上有很多传单。小孩子求知欲很高，什么传单都拿来看，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包，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传单。那时候看了很多的这个，有些不是很懂，但是大致的情况还是了解。简单说，大概是这样。当时就变成，毛泽东为首的一部分的干部，他要推动，要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动机比较清楚，要把当时上海市的市委拿掉，上海市市委在毛泽东

看来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要打掉就要靠群众。可是上海最早的时候，起来造反最厉害的时期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但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由于某些原因，他们造反的对象，他们除了要把上海市长要推翻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来批判张春桥、中央文革、江青，首先批判张春桥。中央文革是代表毛泽东的利益，那就要矛盾。就只能希望寄托于另外一个力量-工人。当时的工人，起来造反的有两大派，派别很多，大体分两派，一派就是平常积极上进，思想进步的工人，一大批所谓的劳动模范，他们站在上海市政府市委这一边，拥护党的，党对他们来说很具体，就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所以这个又是不能依靠。那么，就是另外一批，这些工人数量是不多的，然后他们就，因为有毛泽东支持，数量比较少的这批工人，这些工人在原来工厂里面是属于不被重视，有些还是受批判的，有些问题的，受压制的，有些不满的，就起来造反。当时就分成两派，一派叫保皇派，保政府保党的；另外一派是真正起来造反的，夺权的。因为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张春桥是中央文革派来上海的代表，最后是这一批，夺取了整个权。1966年年底，1月风暴，他们夺了这个权，夺权之后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事情。当年和他们一起夺权的大学生起来反对张春桥，最后就是学生社团被镇压。另外是，血腥镇压原来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另外工人的造反团，有一场是比较血腥和大规模的。新的上海市长动用包括消防队、武装的工人、消防队警察，甚至动用一部分海军，用武力去镇压那个反对他们的另外一派，也是一个工人造反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当时很有名的大工厂，上海柴油机厂，其实就是造坦克的，在黄浦江边，动用军队将黄浦江边封起来，动用10万人，里面的工人像巴黎公社的街垒一样围起来。我印象很深的，晚上打，打下来以后，早上那些人一车车回到自己原来的，进攻的人都是武装起来拿着梭镖的工人，一车车的工人离开工厂返回原来单位，有些人就经过我家，打赢了就唱着歌，那是上海的一次武斗，上海市政府当时新成立的政府组织的工农兵，同时大街小巷贴出标语、照片，把对方工人领袖的衣服剥光，只穿短裤，照片拍出来，脸打了是肿的。这是很真实的，上海工人夺权的，实际感受到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我自己虽然是小孩子，在一定程度上目睹了这个。那时候有一点好，对立双方，发生冲突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贴非常多的这种告示，文字的照片的，一般人发很多传单报纸，自己印报纸到处散发。只要关心这些事，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这些信息当然有很多夸张的片面，但是你汇在一起还是大致看到一个状况。

刘：那个时候听课了吧。

王：那个时候不上课，小学毕业以后，进入中学后都不去上课。老师就到家里来说，你说服家长，你可以放孩子去了，现在学校里打架的不厉害。那时候，虽然算是大学的教授，我知道少年时代，受了教育是非常不完整，小学一年级四年级，三年半的书都是正常的。文革开始，学校我也不能去，去了每次都要被人打。

刘：文革开始就是四年级。

王：那个时候我因为怕别人到家里来，任何一个人到家里来，小孩子进来他就可以对你拳打脚踢。我们通常是把窗帘拉下来，门关着，敲门不开，在家里是这么躲着。干什么呢？我妈就给我讲长篇小说的故事，我欧洲的小说，很多故事就是这么来的，93年、悲惨世界，包括这个红楼梦，这也是很特殊的文学启蒙。

刘：这样听故事听了多少时间？

王：差不多是 66 年的整个一个冬天。

刘：您的年纪还小，当时没有下乡吧？

王：我乡村的经验是有一些，当时也很特别。小学六年级开始，那个时候，每年的六月初，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段时间是农村非常紧张的，要把稻子收割，还要抢种，大概有 3 个星期，那时的农民非常紧张，每天都要劳动，从早上到晚上，缺人手，怎么办呢？就动员城市小孩去郊区农村参加。我们当时小学六年级，老师也来动员，我当时也没事，那时候就去，小学六年级和中学一年级，连着两次，每年去 3 个星期。那是我第一次的农村生活经验。把你当一个小劳动力，推车啊，累得一塌糊涂。那个以后，中学以后就有不断的下乡，组织这样的活动，我每次都会去。有一次印象很深，跟着农民，那个时候还是初中一年级，跟着农民劳动，农民在前面割稻子，没割干净的我在后面割，来来回回来回，终于可以休息会了，我印象很深就是直挺挺躺在泥地上，觉得浑身舒坦，舒服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养成，随时可以躺在地上去，田里去，不像我的女儿看到田就，哎呀。你跟泥土，从小，那个时候也是被迫的，事实上有这个感受。中学 3 年，国家经济困难，不能让中学生毕业，毕业不能给你分配工作，让你再读第四年，但是你也并没有课可以读就组织下乡。中学第四年在上海郊区劳动一整年。那时候学生整年在农村，我学会很多劳动技能，包括划船。因为有段时间，我们负责买菜的同学，老是怀疑他在买菜的时候有贪污情况，没有什么证据就派我说你每天早上和他一起去买菜，我付账。那个同学是很能干的同学，但他比较懒，他就说你要不要划船，我说愿意啊，每天就划，六里水路，从住的地方到镇上去买菜。那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每天早上买菜回来，上海郊区的农村非常好，河水很干净，稻田，污染少。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是那段时间。我所在那个地方还是上海郊区，在全国来说比较富裕，主要是种蔬菜，又靠近上海城市，生活比其他地方好很多。即使这样，农村的贫困，农民一个月吃一次荤菜，我们有下乡和他们一起，我学生自己做饭，我们当时好像是一个星期吃一次这个大荤菜，对城里小孩来说，每天要劳动，独自又饿，那个时候是深切感受。本来以前不知道农村到底是怎么回事，农民的生活状况，那时候是很直接的了解到农民的生活状况，以前只听过父母啊，间接的知道。

刘：当时安排在村里面。那时候六年级三周也都是住在农村吗？

王：当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一个仓库，打扫一半，夏天，地上铺稻草，铺上塑料布、席子，夏天是直接把席子扑在地上，因为地上是水泥地，很干燥。后来就住一年，也是把仓库公共的房子。学生分散住，也有住在农民家里大的地方。有的有床，有的没有床。

刘：这是中学四年级就是劳动。接着是继续读吗？

王：我是初中生，高中没有读，高中在文革废除掉。初中读完之后，我是家中的独子，就没有去农村插队落户。我就在上海的工厂，当了 5 年半的工人，工厂生活对我影响很大。我们那个工厂实行，今天教国营农场，当时叫全民工厂，全民所有制，80 年代才把全民所有制改成国有制。所有制在这里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你说国有，政府代表国家，变

成政府所有。后来又学者分析，宪法的词汇改变，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其实是根本上的改变。那个时候我进的工厂还是全民所有制，工厂给我非常多的，非常好的。无论下乡还是进工厂，生活对我来说都是正面的。工厂的收益对我来说，一个我的师傅是技术非常高，我干的是技术性的工作，技工一类，师傅是技术非常高的，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一个，技术级别的，8级最高一级，我是跟着他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点不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劳动本身是一个让人有尊严的事情，因为他有技术，他可以一个人造一台机器，我跟着他三年学徒，跟着他创造一个新的织地毯的机器，造一台新的机器，我跟他三年，看着他怎么把整个机器造出来。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工人，劳动过程中，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技术，劳动的尊严，劳动异化的程度很低，和现代流水线工人很不同，现代流水线的工人可替代性很强，实际上可以用机器手来代替，只是用人便宜就用人。我师父之前的工作以前是机器无法代替的。再一个，那个时候的工人，上海的国营全民所有制的工人，社会的整体福利是非常好的。我因为是工厂的正式的编制的工人，那个时候这样的工人看病不要出一分钱，如果这个人配偶也可以，还有一个小孩也可以。那个时候社会保障，劳动条件都还好。那个时候的工厂是相对来说，工人的自主性比现在大很多，你要偷懒，你要消极怠工都很多，那个时候有个印象很深，下班的时候，厂门口，不说下班才换好衣服，早早就把衣服换好，骑着自行车，在厂门口一字排开，他知道不能骑出厂门口，铃声一下，夸夸的走。这都是属于落后的工人。像我是干活比较起劲的工人，那时候经常加班啊，加班没有钱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连续工作了2天2夜，最后发现，脑子昏了，做焊接，整个焊反过来，我才知道不行了，回家睡觉去了。现在想起来，工人福利很好，管理人员控制是很弱的，但是这只是一面。还有另外的，工厂里面，那个时候的工厂，三分之一像我一样积极卖力的，三分之一是比较偷懒的，三分之一是比较中间的。比较偷懒，工作不积极的，特别是青年工人，老年工人不偷懒，他们很倒霉，那时候工厂里面不能搞运动，一搞运动，工厂领导就想法子找最偷懒的，带坏头的工人就找他，他们多少有问题，一是偷懒，有些他们还会偷工厂的东西，还有他们会有流氓阿飞的活动，去女同志屁股摸一把，他们会赌博打牌，总要找到他一些毛病，一旦找到他这个毛病就可以随时，工厂里面自己设定临时的拘留所，把这样的人拘留在里面，不准回家，让他每天写交代，弄去开大会批斗。等到运动结束，运动通常要半个月一个月，再放他回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事情，只要是搞运动。我是比较积极的，我经常被派去管他们，那个时候工人，那个时候工厂，工人当中是积极的话，上升很快，特别因为当时有榜样，他是从上海市上去，当时工厂里面有一批青年干部是工人出身，他们是往上传。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也出了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跟我是在同一个车间里，我进去，他就已经开始当正式，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工人领袖来培养。他一直对我很好，对我也不设防，因此看到他的两面性，他在公开场合，很多很正面的习性，包括派他一个什么任务，总而言之显得很正派。同时，他手里有权力，去调戏同厂的女工，后来被人告发，后来被开除党籍。后来71届我考近了华东师大，考进大学之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他后来又被送回了厂里，党籍没有了，没有前途的。他说，你以后，要记住这个教训，一定要离开这个环境。他说，我原来也不是这样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后来就管不住，控制不住，你一定要离开。他这话说得很沉痛。现在很多人回想起来，谈文革时候的工厂文化，那个文化，有他今天看起来很不错的地方，相对今天流水线的工厂-类似富

士康，有他很有意思的地方，也有很封闭而且很不健康的地方，而且也是等级森严。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打引号的，的国民企业，全民工厂的工人，即使是在政府国家权力对他们最开放的时期，上海的工厂的这些工人，在文革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现在，国家权力对他们最开放的时期，尤其他们又是上海人，大概也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识是非常深。所以很多奇怪的事情，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发生。

当时我们上海工人，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收入高，全国工人 36 块钱，上海的工人，像我这样的，多 5 块钱。这个讲起来也是很讽刺，从上海出去的，张春桥这些人，开口闭口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别人批判邓小平。可是他们很清楚，工厂必须保持高的产量，必须给上海比其他地方的工人多的工资。让他们保持高的产量。所以他们自己是在全国唯一的，自己控制的地盘里面这么做，他们说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刘：整个上海工人是 41 块钱。您在工厂，一直到 77 年就报考了。

王：对，只有上海人。那时候，像我这样考上大学的，在我们工厂，考上大学是比较好的。我们是第二等出去考试的，我自己知道又一些比我大几岁的师兄，他们读的书比我多知识各方面都比我们强，但是他们当时不愿意去考大学，因为当时上海全民企业的工人，上海的收入当时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社会地位也还不错。女孩子也容易喜欢他们。他没有必要去读书。读书有一条，全国分配。如果你读了大学，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最好的那一批没有考。像我这样，书读的比较少的，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就去考。那时候考试很容易，大学数学考试第一套是四则混合运算，加减乘除，我考得很差，我数学只靠了 28 分，后面代数完全不会做。幸亏我历史和语文比较高。我是考文科，当时不用考外语。

刘：满分是 100 分吗？只考 3 门。

王：现在的高考，我肯定是考不上。四门：政治、数学、历史和语文。

刘：这段时间，您的父母能当老师吗？

王：他们比较倒霉，他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是一直到 1977 年才宣布平反，才自由。文革他从头到尾倒霉。那个时候我当工人有好处，比方说他的单位官员跑到家里来训斥他的时候，正好那时候我下班的话，不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看见我穿很脏的裤子，就对我比较客气，就不会继续大声训斥我的父母，因为我是工人阶级回家，我是领导阶级。

刘：当时，您去工厂没说你是黑五类。

王：有关系。我是分到其他人不愿意去的工厂，一个小工厂。当时也都是分等级的，我是最差的那一组。还有全民企业人也很多，福利也很好。我们工厂自己没有食堂，很多大的工厂有很好的餐厅，饭菜也好，菜单都很丰富。

刘：您的父母在家里？

王：他们先是在牛棚，他天天在单位里面弄很小的房子写检查，打扫厕所，再后来就送到农村去劳动，一个月回来一次。我在工厂里当工人还会有快乐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比较惨。

刘：这段时期，做工人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看小说？

王：在工厂里面有一个情况的，就是 75 年前，那个时候呢，中央权力斗争，要批判周恩来，表现为发起一个运动叫做：平法批儒。赞扬法家，批判儒家。毛泽东一直是赞扬法家的，周恩来被看成是儒家。批判是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会表现为文化运动，就需要组织人来写这些文章，思想教育问题。上海的工厂，青年工人就成立工人理论队伍。

像我这样的，平时工作很积极，又算是读书人家庭出来的小孩，就被选进去，参加工人理论队伍。工人理论队伍是干什么的，每周，我们那时候上班一周上六天，每周有 2-3 个半天，不用上班，坐在一个地方，大家一起读法家和儒家的著作，法家的著作是拿来学习，儒家是拿来批判的。我学古文是从那时候开始。包括中国先进的一部分的思想文献，那时候开始看，那时候年轻记忆力好。但是读过的那些文字，《论语》《孟子》《荀子》《史记》《商鞅列传》，当时读了是收获蛮大的。

刘：那时候进华东师大，您读中文系，父母都工作了？

王：我能进大学，说明他们没有问题了。他们的问题解决和我进大学是同时的。我们当时算是算 77 年，实际上进大学是 78 年。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大学其实那段时间是和今天相比，大学的气氛是最活跃的，我觉得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政治老师比较痛苦，他是政治老师，那时候中国社会 78-79 年，改革开放的东西已经起来，习惯性的政治控制还在。在这个情况下，大学政治课老师只能照本宣科，不敢另外自己讲一套。我的同学是，除了工农兵学院，不考试，大学生关了十年，十年，全班同学，年纪最大的是相差 12 岁，有些已经是思想很成熟，老师在上面照本宣科，那他就很不满意，就不断和老师辩论。老师很气，他又只能照本宣科，根据规定，和学生辩论，他辩论不过的，因为学生思想不受这个限制。有一次，主要政治课的老师，辩论到最后就哭了。我们当时不懂事，不断逼他，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能乱讲，我们可以乱讲。你想那时候的大学氛围，那时候新来的党委书记，那时候一直受批判，一直被排挤的干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启用来学校当校务，他在 77 级的学生里面，每个班选学生代表，每个月，大概 20-30 个年轻的学生代表，坐在一个大桌子，他做这里，学生代表这样做，他要求学校各个处的处长坐在后排，然后就说：你们提意见。那时候学生代表很会说的，住房伙食很差，宿舍管理有问题，图书馆书不够啊，官僚主义啊，学生每天一个问题，要求相关的处长回答问题，限期解决，那个时候全国都是一样。那个时候大学没有今天这样的考评，没有的，就是两条：一条学生上课，对老师来说，老师上课学生欢迎。第二点，你写出来的文章，老先生们，六七十岁的老教授他们认可，你就可以。当时的标准就是这个两条。所以年轻的老师在学术上也互相比，很清楚。那个时候写文章根本不是为了要稿费，根本不重要，而且那个时候也同时还有政治上的高压，你要发表一个文章，被政府说清楚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那个东西来了后，你文章受批判，你压力也很大。不是像现在的大学死水一

潭，现在的大学是腐烂保守的味道，那时候大学是冲突很激烈，新的东西不断有，所以才不断有学生运动。

刘：你那时候读本科的时候，开放改革，同时地下刊物，民主墙是很活跃的。

王：是的，非常活跃。这个活跃差不多延续到 1989，是一个累积，原来旧式的政治控制越来越松越来越少，89 年达到顶。89 年的时候，北京也一样。实际上，大学是被学生，没有用占领这个词，实际上，学生运动是学校最主要的力量，校长政党委后勤部门，全力和学生配合，怕同学出去游行太累，学校会派大巴把学生接回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是，热水洗澡不是每天都有，只要学生出去游行就一定有热水。餐厅通常是下午四五点关，只要学生出去游行，回来多晚都有热气腾腾的包子，餐厅灯火通明。学生生活处的处长，这个处长专门负责管学生，他也是年轻人，他就把学校所有设备运来，学生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今天回想起来，整个中国社会政治能量的转变，80 年代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从那个事情之后，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大学，大学生来担任主要的，大学生成为主要的行业，包括政府机构，整个政治机构能量的关系根本改变了，那个以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在这个之前，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大家城市的主流人群，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这几个群体，那时社会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的兴奋点整个八十年代是政治，经济问题是次要的，这个阶层以外的其他来说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同时重要的，但是在这个阶层来说，兴奋地一直是政治解放和文化的开放。64 之后，这个主流阶层将注意力改到经济上，意味着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被迫转向所谓的经济问题，个人物质生活问题，整个的政治能量完全变了。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基本情况没有大的改变。你要说影响，像我这一代，像我类似的这样的人，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文革。对我个人来说，上海这个城市对我的影响，我今年 60，绝大多数时间，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上海，离开上海的时间不多，上海这个城市对我影响，所以文革和六四也好，都是在上海的空间里面感受到的。我自己对上海感受很深是，上海市民性格是在中国大陆，上海以外的所有地方，大概都讨厌上海人，一直在想这个，我朋友对我最大的夸奖是，晓明你不像上海人。上海市民特征很明显，上海的功利性，上海的市民见多识广，上海人比较聪明，小聪明，机灵，东看西看，上海人特别厉害，第二个上海市民，比较势利。上海经历的历史，上海的主体是外面的租界，分等级，最高的是西洋人，上海人看不起日本人，但是对西洋人，特别是英国美国就看得比较高，余下是上海人，然后上海以外的其他所有人被看成是乡下人。上海人就是这个，等级观念，很势力。上海人看人是分的，上海人不习惯于平等，这是上海的思维。殖民地搞出来的上海思维，没有平等的概念。我是生在上海，家里的特殊原因，我不大会说上海话，我像我父亲有些口吃，上海话节奏比较快，口吃对我来说普通话容易些。我父母都不是上海人，在家里平常说普通话。很多时候在学校里，习惯于说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最流利的时候就是中学进工厂的时候，和工厂工人说的上海话是脏话非常多的。进入大学之后，我不能在大学里面说这些，变成读书人。慢慢变成，我不大说上海话。我在上海，我长相也不像上海人，上海人比较眉清目秀。我在上海会被当成外地人。因此我即是上海人，又不是很典型的上海人，其实我的位置比较特别，大概看得出上海思维比较出色的地方和差的地方。因此对于都市，生活经验让对现代都市负面的看法和感受比较多。后来我会关心城市化的问题，会对这个现在上海糟糕的城市化的状况，强烈的反应，

这个是上海。有意思的，我是在城市里面获得非常多的好处，相对其他地方来讲，的确有很多先天的优势。比如说，你要出国，其他人要坐火车。我就用不着，直接在上海坐飞机，有便利。同时也因此感受到，城市生活，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在殖民地长起来的，又被限制官僚资本主义密切结合的城市生活，包括上海，六四之后造成政治能量的转化，上海是非常突出的，上海市民入世性格有关，凡事比较实际，上海很少有人会说，这个事情就做了，不考虑别的，上海人很少这样。上海人做一件事情，要想一想，这个事情会不会有成功的可能，没有的话就不做，上海人是不拼命的。上海人的主流阶级转向比较彻底比较坚决，而且也快。这跟上海市民有关。你要说，我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长大，我看到这个城市慢慢膨胀，现在是 2300 万人口，这也是城市的给我的一个启示。

刘：当时您的论文是写鲁迅，当时为什么挑鲁迅呢？

王：和文革有关。我那样的经历长大，所以对于革命政党的变质。我今天用这个话语来讲，以前不懂，但感受很强。以前的那个专制，80 年代流行的是那个黑暗，那个感受是非常的强烈。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工厂里，哪一天我看见，我父亲单位的人到我的厂里来，我就很紧张，我知道那时候麻烦就来了。那个时候实行的是株连制，因为我的父亲有问题，就会跑到我的工厂，找我工厂的领导，让领导对我施加压力。所以整个的那个集权，这个情况底下，鲁迅是被，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文革结束以前，唯一能够看到全集。中国的全集，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的书。所以我唯一大量阅读的是鲁迅的书。鲁迅那样猛烈批评黑暗，这对我有很大吸引力。我这样的人做现代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做文学分析，是用现代文学的文本来做政治和思想的分析，鲁迅当然是最好的。我有一点很好的，算读了鲁迅的书长大的。对中国人来说，幸亏当时有鲁迅的书可以读，一些很基本的思想标准其实是在鲁迅的书里面起来的，后来我做鲁迅研究，很多做现代研究大概都写过鲁迅的书。

刘：我们那时候也是，顺馨宝强都是。您也不是右倾，追求平等解放。您也会谈到革命的问题，您也向往解放的大同世界。

王：转折点，六四以前，我就是你描述的自由主义，当然因为读鲁迅长大，有很强大的政治光环，关心社会，那个时候中国人很普遍，大家都这样，大家关心公共问题和社会，思想资源就是今天所讲的自由主义这一套，改变我的最初就是六四。六四对我来说，有两个东西很明显，一个是美国之音，给我一个打破了我对于所谓西方世界的信仰，所谓的自由民主这套理念的信仰，那时候无条件相信美国之音，说起来是很丢脸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 27-28 岁了还是这样子，思想是非常的右姿态。另外一个，因为六四的事情，超乎我这一辈的人甚至比我年纪大一点的那一辈人，共同的一个预期，当时几乎所有人，我事后都做过一些求证，当时最有名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对学生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有没有想过会是这个样子，很少人会想到。那不觉得这个样子，这个信念是从哪里来，80 年代的读书啊思考啊带来的，主流的想法教给你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包括当时就想，这样事情是不会这样的，即使下命令，军队也不会造作的，即使军队镇压了，人民也一定会起来造反，把政府搞翻了。那个时候中国逃亡出去的人，比方说刘宾雁，不断说最多半年，后来说最多一年，不是他们头脑简单，个人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整个大家对社会的判

断，世界已经到这个时候，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按照这样一套对历史的理解，其实就是自由主义，当时不是普世价值，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时代的，还会那样吗。但是六四和六四以后，证明所有的想法都是幻灭，幻灭感非常强烈。很多地方都讲了，我在 80 年代建立起来的世界观，经过 64 之后彻底破了，就需要重新来，重建新的世界观。而在重建新的世界观的过程中，90 年代初开始，正好中国开始全面走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你在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的时候，你亲身经历是原来的官僚专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保持自由主义的信念是很难的，不容易，你必须非常坚定的说这些都是表面的。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我完全不是，我重新读马克思的书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慢慢开始觉得，甚至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把自己叫左派，那个都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不可能再保持八十年代，自由主义时期。有一点，中国一些很不一样，我是不会因此对现实不满，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我就回到毛那里去，就把毛当作正面的，把毛文本化，对我来说，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是一段历史，延续到今，还是这个党，甚至还是同一个人，还是五十年代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到了 80 年代，提倡搞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其实是同一批人改变了，主动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是毛泽东本人，包括他还跟尼克松说，我跟你的共同性比苏联人更多，这是他说。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从八十年代那样的比较幼稚和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转向今天广泛意义上的，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具体立场上面的一个左翼，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不同程度的，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受现实刺激而影响很大的人。我不是有那个力量守定一个立场，不管天下怎么变，我就是那样，我不是有那么强的那个固执或者是自信，我没有。我大概只有对文学的喜爱是一以贯之的。其他还是会跟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

刘：就是一一直保持一种开放性。

往：这说得好，鼓励我。不是说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抱着一套东西。现在变化很大，怎么去重新梳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不是从 49 年开始，整个中国的 49 年革命本身是当时遭遇的各种危机。您那天说的，革命要看百年两百年以来，具体的状况里面，怎么推进社会的发展。

王：农村生活经验很短，这些对我来说正面，我最后离开了工厂，这个是。如果一个人，一直长期，我也有一些朋友，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工厂、农村，他的遭遇又不同。青春无悔，都是离开的人说。工厂和农村的，后来才很惨的。不愿意读大学的，工厂里面的后来很惨，下岗，非常贫困，我是因为出来了，就转化成是这里面的，这个就是感到，社会生活变迁，历史的残酷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么一场运动。客观来讲，很多城市的文化和知识，通过那个道路，奇特的城市的，反过来哺育这个农场，也在这个过程中，一两千万知青中出现了，可能几千万，相对来说有农村生活经验，有某些精神特质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企业家、专业人士，而数量比这些多得多的其他人，说难听点是当了牺牲品。